

# 戎狄之旅

——内蒙、陕北、宁夏、陇东考古考察笔谈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方联合组成的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课题组自2004年组建以来,在甘肃东南部及陕西西部经过多年连续不断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已取得多项重大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成果,将秦文化和西戎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随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许多新的问题和困惑也产生了,特别是与周秦文化密切相关的西戎文化至今仍有许多谜团。例如,在甘肃陇山东西两侧发现多处寺洼文化遗址(或葬地),而这些寺洼文化遗址又与早期秦文化或周文化遗址交错分布,那么早期秦文化及周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关系究竟怎样?历史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大量关于犬戎、玁狁的记载,犬戎与玁狁的分布范围和活动中心到底在哪里?它们的考古学文化又是什么?以甘谷毛家坪B组遗存和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地为代表的春秋战国西戎文化的分布范围及文化源头在哪里?马家塬战国西戎文化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与内蒙、陕北、宁夏等地的戎狄文化关系又如何?凡此种种。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应当扩大考古调查范围,特别是十分有必要对与甘肃东部相邻的内蒙中南部、陕西北部、宁夏中南部等地进行学术考察,以拓展我们的视野,为今后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考古探索提供思路 and 方向,这便是组织这次学术考察的主要目的。当然,考察同时也关注其他学术课题,如甘肃新石器文化与该地区同期文化的关系?商周时期的铜器、铁器、金器与内蒙、宁夏、陕北之间的联系,秦直道及北方长城地带秦汉离宫别馆的分布及

特点等。

考察活动从7月8日开始,至28日结束,总计20天。考察组成员分别从西安、兰州、北京出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集中,途经鄂尔多斯、榆林、延安、银川、固原,最后到达甘肃清水,驱车行程6000多公里。考察以观摩各省、市、县的博物馆、考古所、文管所陈展或库房的文物标本为主,并实地踏查了一些重要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参观了自治区考古所的和林格尔工作站、凉城工作站、内蒙古博物馆、伊金霍洛旗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东胜区文物库房。在陕北先后参观了榆林市文管所标本室、榆林汉画馆、子洲县文管所、靖边县博物馆、吴起县文管所等处,实地考察了朱开沟遗址、鄂尔多斯秦直道遗址、神木大保当汉墓墓地、神木新发现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聚落遗址、清涧县辛庄遗址、富县秦直道遗址、洛川寨头河考古发掘工地等地点。在宁夏自治区先后参观了自治区考古所库房、自治区博物馆、水洞沟遗址博物馆、西夏王陵遗址博物馆、同心县博物馆、固原市博物馆、隆德县博物馆等地。在甘肃省考察了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及新出土的文物,清水县博物馆及李崖遗址,并在清水县开会做最后总结。参与考察的人员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辉、侯红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王占奎,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信立祥、戴向明、梁云、游富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陈建立、张寅、路国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曹大志。徐光冀先生得知消息后,专程赶到陕北,参加考察队活动四天,期间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本次考察得到相关省市县文物考古部门的热情接待,并和他们交

流了相关学术问题。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戎狄之旅”考古考察感言(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光冀)

这次有幸应邀参加了陕北地区的考察,也使我深感这次考察之重要,得到了收获和启发。除此次考察的主题之外,对我来说一个意外的收获是考察了位于靖边县的统万城遗址,它是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公元407~431年)的都城,城址分东西两城,外有郭城,保存较好。苍白的夯土和西城高大的隅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说这次考察的主旨是早期秦文化的渊源、发展直到秦统一帝国建立的历程,而对统万城遗址的考察,则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至隋唐帝国的建立相关。

前述五家单位自2004年组建“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以来,对甘肃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的考古调查,对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西山遗址、清水李崖遗址的发掘,将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的发掘,更揭示出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独特面貌。西汉水上游与早期秦文化同时存在并密集分布的寺洼文化遗址,以及在秦国统治下的以马家塬墓地为代表的战国西戎文化,无不揭示出西北、北方民族文化与秦文化的紧密关系,使得对西北、北方戎狄古文化的研究,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而参加者前期的学术准备,也正是这次“戎狄之旅”考古考察取得丰富收获的原因所在。

戎狄代表着我国西北、北方的古代民族,在古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同一时期也有不同的族群,学术界历来意见纷纭。因此,戎狄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大课题,需进行长期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首先要分辨这些族群的遗迹、遗物的文化特征和内涵,进而研究其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方法,将同一区域(打破现今的行政区划)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内涵、分布、年代廓清,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分析其族属,研究其社会历史,才有可能形成共识。同时应考虑到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既有密切关系而又有区别,其情形相当复杂,不必轻易带上族属的帽子。在此进程中,

应提出若干子课题,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每一步骤都应有阶段性成果,经过长期的工作和研究,方能逐步究明这一大课题。参加这次考察的年轻学者,值得用毕生的精力从事这项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建议“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工作,制订长期规划和新的五年计划,以期对秦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对寺洼文化、马家塬战国西戎文化的研究取得新成果。马家塬墓地应是地区性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目前仅发现墓地,尚未发现居住遗址,需进一步调查发掘居住遗址,以全面了解其内涵和特征,有助于对其文化的了解和族属的识别。当然联合考古队也可适当扩大,将内蒙古、宁夏的相关考古单位也联合起来。也可以多种形式,如共同制订计划,按课题要求分别进行工作。总之要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共同工作,在戎狄文化研究的大课题下,取得新的学术成果。

戎狄与华夏分异的史前背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戴向明)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与北方诸民族此消彼长的冲突、碰撞与融合,几乎贯穿了古代历史发展的始终。追溯到先秦时期,有关北方及西北诸族的文献记载支离破碎,与其有关的考古发现也十分有限,致使迄今对所谓“戎狄”各族文化面貌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然而,当学者们研究诸如“秦文化”、“晋文化”时,往往深感西北与北方的戎狄文化已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就成了此次从内蒙古中南部到陕北、宁夏和甘肃境内进行考察的重点内容。通过这次考察,我本人又感到商周时期戎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华夏与戎、狄之间的分异,都有其史前的背景和基础。

从有迹可循的仰韶早期开始,位于豫北冀南和陕西关中等地的仰韶文化就不断地北上、西进,传播到了从冀西北、晋中北、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即通常所谓的“三北地区”)到西北甘青地区的弧形地带。仰韶中期陕、晋、豫庙底沟文化的兴起更是以异常强劲的势头辐射到了上述所有地区。到仰韶晚期,中原文化内敛,各地有强烈自身特色的地域文化纷纷涌现,如内蒙古中南

部的海生不浪类型、甘青地区的马家窑类型等,但这些地方文化仍表现出较多的中原文化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庙底沟二期到龙山时代,“三北”到西北的中原色彩日趋淡化,西北的半山、马厂类型和新兴的齐家文化,三北地区的龙山期文化(分别有老虎山文化、大口一期文化、游邀文化等称谓)愈益表现出鲜明的自身特色,与中原龙山时期各文化呈鼎足之势。在这环绕中原的弧形文化带渐成气候之后,反过来自然会同中原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其中西北的齐家文化与关中的客省庄文化互有渗透,而三北地区的龙山文化则对中原文化格局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北方与中原的折冲中,于晋南豫西形成了“陶寺·三里桥文化”。在面貌相近的陶寺类型和三里桥类型中,除了从各自庙底沟二期文化延续下来的因素,两者共有的双鬲和单把鬲为其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一般认为,单把鬲起源于陕西关中,双鬲起源于北方,两者所代表的文化群体分别东进、南下,共同参与了晋南豫西龙山时期文化的创造。其中,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类型直接面对三北龙山文化的冲击,从而在陶寺中期以后一改早期那种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传统,形成了以双鬲肥足鬲等为代表的新的文化类型。但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是双向的,此次考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陕北榆林等地都发现有矮领肥足鬲等陶寺类型的典型器物,数量虽不多,但已足见陶寺对北方龙山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通过上述的梳理,可以看出北方与西北自身文化传统的形成发端于仰韶晚期,而成熟于龙山时代。到以后的青铜时代,北方与西北大范围文化统一的局面似被打破,先后涌现出多个分布地域相对较小的文化类型,如北方的大口二期文化、朱开沟文化、西岔文化,西北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另外,这次考察我们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和宁夏的固原地区还见到了一些新发现的两周时期的遗存。商周时期的戎狄文化应主要从这些已知和未知的青铜文化中寻找、辨识。这些存在于各地的文化遗存,很可能就是戎狄概念之下的不同族群所创造的文化的遗留。这些青铜时代的文化同北方和西北龙山时代的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渊源

关系。因此可以说,戎、狄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分野肇始于龙山时代。

戎狄文化探索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戎、狄之间的分野,包括空间分界与文化内涵方面的区分。文献所载的“西戎北狄”,只是表述了两者分布的大体方位,目前还难以从考古学文化上做确切的界定和区分。不过,这方面可以从史前龙山时代北方与西北的东、西分异得到一些线索和启发。这次考察使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从陕北到河套以内的鄂尔多斯及其以东地区,为三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与其相邻的宁夏、陇东及其以西地区则为齐家文化的分布区,两者形成了虽互有影响、但面貌迥异的不同文化圈。这两个文化圈同中原文化圈相对峙,这很可能就是后来狄、戎与华夏集团分野的史前基础。不过,这些感性的认识尚待大量的实际工作和研究给予澄清。

关于晚商时期晋陕高原文化的思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 曹大志)

笔者有幸参加了此次在蒙、陕、甘、宁的学术考察活动,收获颇多。由于近来研究重点为晚商时期的晋陕黄土高原地区,这里仅就两个相关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李家崖文化的年代下限与晋陕高原的周文化:关于李家崖文化的年代下限,以往学界一般采用李家崖遗址发掘者的观点,认为该文化自商代后期延续至西周中期。此次考察中,我们在榆林市观摩了李家崖遗址的出土遗物,所见西周陶器只能早到西周晚期。这些陶器属于较典型的周文化样式,与李家崖文化的器物群差异很大,没有发展演变关系。换句话说,以往认为延续至西周中期的李家崖文化,实际上包含了独具特征的李家崖器物群和西周晚期以后的周式器物群两部分。不仅如此,笔者通过观摩榆林市所藏各县的文物普查标本,以及山西吕梁山地区的普查标本,认为晋陕高原的周式陶器,普遍只能早到西周晚期,且数量不多;明确的西周早、中期陶器,目前还没有发现。如此一来,广泛分布于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仅笔者见到标本的遗址已超过150处),因不见西周文化因素(陶器与铜器)的任何影响,其年代下限恐怕不会晚于西周早期。

晋陕高原铜器群的年代: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黄河两岸出土铜器群的年代。过去学界通过跨文化的交叉断代,普遍做出的结论是商代晚期,这与陶器反映的情况正相适应。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了与此不同的新颖观点。他们根据组合的不同,将晋陕高原的铜器群分为以容器、工具为主和以武器为主的两个类型,认为后者晚于前者,可迟至西周中期,并以此为基础得出了一系列重要推论。实际上,多种武器还没有成熟的年代序列,在缺少年代特征明显的器物共存时,孤立的判断年代是很困难的。例如有的学者通过排比提出柳林高红铜器群已晚至西周中期,笔者曾对釜内残存木屑的“塔形器”取样进行C14测年,所得数据为1390~1110BC(校正后95.4%),仍以晚商时期为宜。以往研究表明,晋陕高原的青铜器很多来自本地区以外,在此情况下器物群构成的不同更可能受器物来源、本地社会的再分配、社会分化等因素影响(事实上只发现武器或工具的器物群数量远超过拥有铜容器者)。总之,黄河两岸分别与西周王畿和晋国临近,与中原文化区的往来条件远胜于晚商时期,但晋陕高原普遍缺乏西周时期陶器和年代明确的中原铜器,周文化分布区也几乎不见以往认为属于李家崖文化的铜器,在此条件下,把一些不易断代的武器定在西周时期,尚嫌证据不足。

关于文化中断的一个解释:从更大范围来看,中原与北方地区通过晋陕高原的交流在商代晚期之后显然已经中断,这一点与太行山东麓的延续性反差明显。根据前面陈述的情况,此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晋陕高原聚落的锐减。至于对它的解释,理论上存在多种可能(如环境变化、大范围灾疫),目前还缺乏考古证据,笔者则根据一些线索认为周王朝崛起前后曾打击并大量迁徙了当地居民,在此作为一种可能提出以抛砖引玉。这些线索包括:1.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王季时期多次征伐戎人,比如征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2. 成王时分封叔虞,赐怀(媿)姓九宗。多年工作表明,商代晚期晋南地区人口稀少,因此这些人口可能不是本地土著,而是吕梁山区迁来的居民。3. 《小孟鼎》铭文记载康王时一次战斗即杀鬼方4802人,俘获13081人,数量如此庞大的人群,不会都是战士,而是包括男女

老幼的全部人口。在这些冲突和移民政策之下,晋陕高原的人口可能大量减少。早期国家在扩张中通过大范围移民控制人口是世界史上屡见的现象。不过应该承认,上述假说的前提是文字史料中的鬼方是媿姓人群、鬼方位于晋陕高原,这些尽管已是学界成说,但仍有待坚强的证据。

关于羌戎文化考古的思考(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信立祥)

自秦文化考古项目启动以来,羌戎文化就与秦文化始终纠结在一起。甘肃礼县的西山古城经过发掘,已经被推论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秦国第一个都城——西犬丘。考古调查发现,在西山古城周围,密集分布着时代上早于古城的寺洼文化的遗址和墓葬。而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戎王墓地的发掘,则直接揭示出战国晚期当地戎文化与秦文化及北方草原文化的密切关系。随着秦文化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队日益认识到,要揭示秦文化的发展进程,必须开展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与研究。这一点,考古界已经取得了共识,以至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曾建议甘肃省成立“羌戎文化研究所”。

在此次历经四省的考察中,羌戎文化是一项重要内容。虽然是走马观花式的寻觅,仍发现了有关羌戎文化的一些考古学线索。在内蒙长城沿线的凉城和鄂尔多斯等地的考古发掘品中,都发现了东周时期羌戎文化的典型器物——陶铲足鬲,证明了东周时期羌戎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确实有着密切联系。正在发掘的陕西洛川县寨河头战国早中期戎人墓地引起了考察队的极大兴趣。该墓地位于葫芦河北岸的平坦台地上,共有三四十座小型竖穴土坑墓,均为单人葬,随葬陶器以粗绳纹三足罐、束颈绳纹小罐为主,个别墓偶出铲足鬲。而宁夏固原博物馆等单位的藏品中,不仅有寺洼文化的陶器,而且有当地战国时期戎人墓地出土的青铜车饰和牌饰,风格与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墓地出土的车饰、牌饰极为相近。从地域上可以大体推定,这两处墓地都应属于义渠戎,前者为义渠戎中下层的墓地,后者为义渠戎贵族墓地。对整个羌戎文化来说,这些线索虽然只是只鳞片羽,但也证明了羌戎文化在考古学上是有迹可寻的。

目前,羌戎文化考古基本上处于空白状况,开展起来面临很大难度。由于羌戎文化地跨西北数省区,仅靠一个省区的工作是无法完成的。因此,必须组织跨省区、跨学科的考古大联合、大协作,首先在陕西、甘肃、宁夏、内蒙等省区开展工作。当然,这种跨省区的考古工作必须制定较长期的规划,有目的地逐年加以实施。由于羌戎文化时间跨度大,头绪繁多,开展考古工作必须有强烈的课题意识。其总课题下的子课题,可以依据文献按时代、地域进行设置。商至西周时期,羌戎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而在时间、地域上与之相应的考古学文化是寺洼文化,两者之间能否契合应成为一大课题。东周时期,羌戎族称大多以地名命名。大体上陇山以西有狄(翟)、獯、邽、冀、緄、緄诸之戎,泾水之北有义渠、乌氏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可以根据其族名,有目的地寻找各支羌戎的考古学文化。迄今为止,关于周秦时期的羌戎文化,考古发现的大多是墓地,对其聚落几乎一无所知。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改变和创新考古调查的方法。

在探索羌戎文化时,羌戎对秦统一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对这一问题,史无明文。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九年(前238年),长信侯嫪毐作乱时,曾“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征调“戎翟君公”统领的戎人。从这条记载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秦昭王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三郡后,原盘踞在那里的羌戎部族首领已被削去王号,接受了秦王“君公”的封爵,成为秦中央政府直属的臣僚;二是秦王可以直接调动这些“戎翟君公”统辖的羌戎部队去进行战争。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在秦始皇攻灭关东六国的统一战争中,秦国的军队中一定有相当数量的羌戎族部队。这些羌戎人“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后汉书·西羌传》)的强悍性格,无疑大大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缩短了统一战争的进程。当然,要证明这一点,需要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努力。

陕甘宁交界地带考古考察心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王占奎)

陕甘宁交界地带自然面貌具有独特之处——中间为黄土高原,西北为沙漠地带,向南

则是关中平原。这一地带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周秦两个王朝的建立与该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后,两汉时期与北方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关系之密切更是人尽皆知,然而关于匈奴等族群的考古学文化的证认仍然处于迷蒙状态。

从考古学的实践来看,随着先周文化、周文化和早期秦文化研究的深入,各自与其北方或西北方古文化关系的研究自然而然地被提上日程。本次考察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从考察的情况来看,现在把这一地区纳入到未来一段时间内一个重点课题,不但是必要的,也可以说适当其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往各县所收藏的文物数量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有些具有发现或出土地点。再加上“三普”资料,可以为课题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其二,陕甘宁三省区近年来在“基建考古”和一些课题研究中把该地区的古文化系列框架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虽然这一时间框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对于识别一些采集品或陶片的年代虽然不敢说十分准确但基本上可以有六七成的把握。

其三,近年来的新发现已经让人们看到了曙光。如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和陕西黄陵、富县、洛川交界地带的寨头河墓地的发现,为识辨战国、秦时期的戎狄文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基础。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两个墓地的发现将会成为北方戎狄文化研究的重要的里程碑。

其四,该地区的工业和基本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为相关课题提供了机遇。

“戎狄之旅”学术考察感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 路国权)

我有幸跟随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课题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主题为“戎狄之旅”的学术考察,沿途参观了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宁夏中南部和甘肃东部多个市县的博物馆陈列、库房和考古新发现,收获颇丰。这里要谈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西周文化分布的北界和西北界。以往经过发掘的西周文化遗址最北分布到陕西横山县黑水沟遗址,西北方向最远分布到宁夏固原市

大旱峁遗址。这次考察中在无定河以北的陕西和内蒙古地区、宁夏固原以北地区的县市博物馆中都没有发现西周文化遗存的线索,西周文化分布的北界和西北界基本可以确定在陕北无定河至宁夏南部清水河一线。这条界线与战国中期秦长城基本一致,与泾、洛、渭河上游的盐业资源丰富区的外边缘也基本一致。这条界线的确认对于研究界线之内的西周文化与界线之外的西周时期其他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如无定河以北和以东的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它们的族属以及与西周文化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宁夏南部清水河流域以北相当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化面貌,及其与春秋晚期分布于此的杨郎文化的关系都还需要探索。

第二,甘肃甘谷毛家坪 B 组遗存渊源的线索。毛家坪 B 组遗存可能是西岔文化西迁南下的后裔。西岔文化是近年发现的以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命名的、以双釜筒腹鬲和罐等为典型器物的一支新考古学文化。西岔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流向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它在晚商和西周时期与关中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交流,在关中地区的扶风刘家墓地曾发现西岔文化的典型器物双釜筒腹鬲(M3:1、M3:2),在丰镐遗址、周原遗址和长武县碾子坡遗址也有发现(如沔西 97H18:127 和 97H18:128、周原礼村 02LCH14、碾子坡 M1:1 等)。这类以颈部装饰双釜为特征的筒腹鬲在甘肃庆城县博物馆也曾发现。这类陶鬲以往曾被称为“异型高领袋足鬲”,现在看来应该属于西岔文化因素。西岔文化与毛家坪 B 组遗存在年代上还存在着较大间隔需要填补,但二者的文化面貌有比较强的亲缘关系,毛家坪 B 组遗存有可能是西岔文化西迁南下的产物。

第三,杨郎文化的新发现。洛川县寨头河新发现的杨郎文化墓葬进一步丰富了杨郎文化的内涵,尤其是与三晋风格的铜器、陶器的共存关系对于进一步确认其年代和族属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来看,杨郎文化的分布范围已经越过子午岭分布到洛河一线,与史书记载的义渠戎国的位置有较大重合。《秦本纪》记载战国时期义渠戎国与秦、魏接壤,洛川寨头河杨郎文化墓地中出土的三晋式铜器和陶器与杨郎文化典型陶器共存,

可能是义渠戎国与魏交往的反映。杨郎文化的族属可能包括义渠戎。

关于两周时期西戎文化的思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赵化成)

历史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大量关于犬戎、獫狁的记载,他们在西周时期与周王朝经常发生战争,甚至是导致西周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笔者早年曾论证寺洼文化属于犬戎的遗存,这已为许多考古学者所接受。然而,笔者当年在论证寺洼文化族属时有意回避了“獫狁”问题,这是因为獫狁的问题比较复杂,其中关于獫狁的中心活动地域学术界争论较大。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但目前仅靠一般的文献及地名考证已很难达成共识,而寻找其考古学文化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关键。例如,有些学者认为獫狁属于北狄系统,其活动中心在陕北及晋西北一带。但迄今为止,在这一地域极少发现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中晚期的遗存,这也是这次考察的主要学术目的之一。但遗憾的是,仍然没有什么线索可寻。按道理说,能够和周王朝相抗衡的獫狁族如此强大,应当留下数量可观的、发达的文化遗存,但为什么在这一地域找不到它们的文化踪迹呢?一般来说,说有很容易,说没有就需要相当慎重,但到了一定的阶段,说没有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獫狁的活动中心不大可能在陕北及晋西北一带。至于有学者主张在晋南一带,但从獫狁入侵西周京畿之地及周王朝征伐獫狁的路线看,这种可能性很小,更何况考古学文化也无法支持这种观点。也有学者考证獫狁的活动中心区在陇东一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撇开《诗经》及周代铜器铭文中多数地名与该区域有关外,我们还注意到,在《诗经》及铜器铭文这些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中只有“獫狁”的称谓,但在《史记》、《汉书》等稍晚一些的文献中则称之为“犬戎”;《诗经》及铜器铭文记载獫狁在西周中晚期与周王朝经常发生战争,但《史记》却说灭掉周王朝的是犬戎。看来,这很可能是不同时代文献采用了不同的称谓而已,也就是说犬戎与獫狁本身就是一回事。从寺洼文化的分布地域、时代、文化特征及与周秦文化的密切联系看,是目前唯一可以将其与犬戎、獫狁联系起来的考古

学文化,所以说寺洼文化属于犬戎、獫狁的文化遗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诚然,要最后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在陇山东西两侧分布着众多的西戎部族,人们最早认识这一时期的西戎文化是从铲足鬲开始的。后来,宁夏南部的杨郎类型、甘谷毛家坪 B 组遗存等进一步揭示出春秋战国西戎文化的某些特征。而近年来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的发掘,更显示出这一时期西戎文化的复杂性,其不仅具有土著因素,中原(秦)文化因素,并且还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以及西方文化因素等。过去我们曾怀疑以铲足鬲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源头可能与寺洼文化有关,但现在看来,以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地、宁夏杨郎墓地为代表的西戎文化所表现出的独特葬俗及主流文化特征与寺洼文化大相径庭,而与北方草原文化特征更为接近,因而,他们更可能是某支北方或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所创造的文化,这其中也可能融合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在内。这次在内蒙、陕北、宁夏的考察,更增强了这种感性认识。有学者称铲足鬲可能来源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但我们只在个别地点看到了几件铲足鬲标本,并且年代都偏晚(战国中晚期),与甘肃东部的广泛分布和大量存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铲足鬲是否来自北方草原地区还很难说。这次在洛川县寨头河考古工地看到了新发掘的战国西戎文化墓葬,其葬俗与随葬品与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地又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西戎文化本身可能很复杂,其文化来源及族源或者并非单一。

铲足鬲与东周时期西戎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梁云)

这次考察虽然时间较短,但接触到的海量历史文物信息恐怕要很久以后才能被消化。参观途中有一些大家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铲足鬲(或曰铲形袋足鬲),作为东周时西戎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原来以为它仅仅分布在甘肃东部的遗址和陕西战国秦墓中,结果这次在内蒙古考古所凉城工作站见到了,在陕北洛川寨头河墓地见到了,在宁夏彭阳小河湾遗址的标本中见到了,在固原博物馆也见到了。可见它的分布范围非

常之广,涉及多个民族,恐怕也不是一个考古学文化所能涵盖的,涉及年代、来源、族属等一系列问题。

在上世纪 80 年代发掘的毛家坪遗址中,所谓的“毛家坪 B 组遗存”其实包含两种陶鬲,一种足根作铲形,全出在②层及其下的瓮棺葬;另一种作柱状实足根,全出在③层及其下的瓮棺葬中。二者地层年代早晚判然有别。根据共出的秦文化器物,铲形足跟鬲相当于战国早期,柱状实足根鬲相当于春秋中晚期。虽然足跟形态有差别,但两种鬲整体形态风格一脉相承,显然属于同一种文化遗存。毛家坪是目前唯一经正式发掘的含有铲足鬲遗存的遗址,它的地层序列有标杆意义,或许说明铲形足跟鬲的年代就是战国时期的,难以早到春秋。毛家坪之外的地方,包括甘、宁、蒙等地的铲足鬲,均为博物馆征集、收藏或调查采集,没有地层单位,从形态上看也早不过毛家坪。陕西关中地区的铲足鬲,都出在战国中期以后的秦墓里,反映了秦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周边西戎文化的大幅度吸收。

毛家坪的地层序列说明这种遗存的陶鬲经历了从柱足到铲足的变化,因此,在追寻铲足鬲的来源时,自然要把目光放在它的前身——柱足鬲上面。以前大家倾向于铲足鬲来源于寺洼文化。这里面可能有误区。寺洼分裆鬲的足根为乳头状,不见柱足或铲状,此其一。寺洼鬲从早到晚腹径逐步上移、足根由长变短、裆部由高变低;毛家坪 B 组鬲出现伊始就是高分裆、腹径偏下的特征,二者在演变逻辑上不接茬,此其二。寺洼鬲大多数带耳或无耳,极少数带釜。铲足鬲很多带釜,此其三。如果把目光转向东北方,子午岭以东的晋陕高原古文化却一直有双釜、高分裆袋足、柱状实足根陶鬲的传统,包括柳林高红、李家崖、西岔文化都有这种陶鬲。所以许伟、杨建华等先生都认为毛家坪的柱足鬲是这种鬲向西流传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但二者年代上间隔太大,还有待新的资料去填补缺环。

毛家坪 B 组被推论为“冀戎”的遗存。近年在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也出土了铜、陶铲足鬲,与草原气息浓烈的车马器共出。张家川地属天水,马家塬墓地可能是文献中“绵诸”戎。甘肃庆阳博物馆也藏有铜铲足鬲,那里是“义渠



戎”的地盘。宁夏固原、中卫博物馆的铲足鬲可能属于“乌氏”戎。这次考察所看陕西洛川县新发掘的寨头河战国墓地,也出了一件铲足鬲。《后汉书·西羌传》记“洛川有大荔之戎……。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大荔偏在洛河下游,因此寨头河墓地可能还是属于义渠戎。内蒙的铲足鬲可能属于北狄。甘肃永昌三角城也出铲足鬲,那里是沙井文化遗址,沙井文化墓葬人骨为北亚人种,和胡人一致。除了秦人之外,使用铲足鬲的人群包括戎、狄、胡。所以说“铲足鬲文化”的提法是个伪命题,不能成立。

秦与戎——羌戎考察的一点感想(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游富祥)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从封国向帝国迈进的重要阶段,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2004年五家单位联合组建“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首先从甘肃东部开始,重启探索秦文化的渊源和发展脉络。在这数年的探索中,我们发现在秦的起源、发展中,秦与戎始终纠缠在一起,关系密不可分,比如04年考古调查,我们在西汉水流域发现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对峙和交缠现象,还有06年发掘的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的文化面貌,此后我们还在马家塬周围调查发现了4~5处相同文化面貌的墓地。通过这些发现,我们感觉到秦、戎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并且由于马家塬墓地出土器物包含有大量的北方文化因素,比如车马饰件、牌饰、短剑等都有浓重的北方式的味。但是究竟羌戎的文化面貌是什么?是毛家坪的B组遗存?亦或是现在发现的马家塬?或者是二者都是?这个还难以回答。基于此,课题组决定进行一次羌戎文化考察,以铲足鬲和马家塬器物群为线索,调查内蒙东南部、陕北、宁夏和甘肃东部等地,以期在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内能够对羌戎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经过整整20天的考察,羌戎考察队行程约6000公里,跨四省,考察数十个县市博物馆和遗址,期间惊喜不断。在内蒙的和林格尔、鄂尔多斯、陕北黄陵、宁夏都发现了同类的遗存,但都相对零散,特别是铲足鬲,经常都只是一件一件地出,所以对于其整体的文化面貌难以把握。但是

这次考察的陕北洛川寨头河墓地有望解决这个问题。寨头河处于黄陵洛川的交界地,子午岭东侧,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配合基建发掘的一处墓地,出土器物包括铲足鬲在内,组合主要是鬲和夹砂小陶罐,特点是陶质较疏、火候不高,陶色不均匀。这样一个完整的墓地的揭示就能较为全面地了解以铲足鬲为特点的这一文化的面貌,而且这样的墓地肯定不止寨头河一处,以寨头河为线索,调查周围肯定还能发现相关的遗址和墓地,如此则对于羌戎文化的研究能更加深入。

此外,此次调查的以铲足鬲、动物形牌饰、带饰为主要特点的文化大多分布于内蒙东南部呼和浩特以南、鄂尔多斯高原、陕北、宁夏固原、甘肃东部,这些地区基本都包括在秦长城以内,说明从地域上来说这类文化都处于秦的控制之下,可能属于被秦征服的羌戎的文化。《史记》记载在秦的扩张中征服了数量众多的羌戎,这些历史文献记载的羌戎地域上与这些考古学文化大体相合,但是具体哪一个文化对应哪一支考古学文化,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期待将来能解决。

东周戎狄文化考察印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 张寅)

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宁夏、甘肃东部四省邻近地区可区分为两个较大的地理单元:甘宁地区以陇山为中心,其主要山脉为南北走向的六盘山,东西两侧为分布甚广的黄土沟壑梁,或间有平坦的塬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为海拔一千米左右的开阔高原,该地区有黄河迂回流过形成的河套平原和黄河环绕的鄂尔多斯高原,其北部有阴山和大青山横亘于内蒙古中部。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分布有众多考古学文化,其中陇山东西两侧以“杨郎类型”、毛家坪B组遗存、马家塬战国墓地为代表的考古遗存被认为是文献中记载的这一时期生活于该地区的西戎所遗留;而对于分布于内蒙中南部地区的以桃红巴拉墓地、毛庆沟墓地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遗存的族属,学界认为其应是文献中提到的林胡、楼烦、三胡,并与后来活动于此的匈奴有着密切的联系。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当是之时,秦



晋为疆国。晋文公攘戎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我们知道，对于将戎狄与方位相配的观念是战国秦汉间的学者为整齐划一而创造的，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考古学文化层面看未必那样容易区别。墓葬往往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其中包括葬俗及随葬品两部分。东周时期的西戎文化与北狄文化的随葬品都普遍流行北方系青铜器和单双耳陶罐，其相似性很高。一直作为东周西戎文化典型器物的铲足鬲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及宁夏南部地区，其应是西戎的特色，虽在内蒙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发现，但很可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而在北狄遗存中存在一些肩部饰有波浪纹的陶罐，这在东周西戎文化区域是不见的，应该与之后匈奴文化中流行的波浪纹罐有直接的亲缘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北狄文化墓葬具有一定共性，其中绝大多数墓葬的形制十分统一，均为竖穴土坑墓，流行仰身直肢葬，在墓道的填土及墓室内均殉葬有大量的马、牛、羊骨。这种葬俗应是北狄文化的典型特征。而分布在甘宁地区的西戎文化墓葬具有如下特点：一、洞室墓占主体，有少量竖穴土坑墓。二、墓葬以东西向为主，有部分南北向墓。三、葬式均采用仰身直肢葬，不见其他葬式，可见西戎文化是以洞室墓为特征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内蒙古地区的包头西园、小双古城、新店子等三处墓地中发现有洞室墓 50 座，且多为偏洞室墓，对于这种现象，我们目前还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但其偏洞室墓的特点与甘肃张家川马家塬西戎墓地的墓葬形制有一定共性，其之间可能存在有文化交流，甚至于人口的迁徙。

这次考察使我们对于分布在该地区的戎狄文化有了直观且深刻的认识，为将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线索，通过对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辨析及其间关系的思考，也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四省考察有关冶金考古的一点认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陈建立）

2004 年以来，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家单位联合开展的早期秦文化研究业已取得

大量成果，对了解秦早期的文化面貌、秦汉之间的文化传承以及对戎人文化的确认有了很多新认识。特别是礼县大堡子山、张家川马家塬和秦安王家洼墓地发掘出土的包含有多种工艺的金、银、铜、铁、锡和玻璃制品，为研究当时的工业生产和工艺水平提供了翔实资料。根据初步的实验室分析结果，反映出这些文物的制作技术具有多源性，所以在一个更大的时空框架内考察这些墓地出土金属及玻璃态材料的原料来源、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等问题，将有助于理解西戎部族之间、秦与其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

而利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对出土文物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制作工艺，推测其产地，探讨各类材质文物的发展规律，进一步研究战国时期中西方的技术与文化交流等问题，充分揭示出土文物的科技内涵，并开展形式多样的展示活动，是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文化建设的良好契机，所以由多学科人员参加的考古调查活动，可加深不同专业人员的互相交流与理解，更好地促进研究的进展。我们的这次考古考察活动，考察团各位同仁及各地的同行互相交流，体现了这种学科交叉融合，收获颇丰。

本次考古调查参观了内蒙古、陕西、宁夏和甘肃等的考古所、博物馆、文管所以及遗址等，观摩了大量实物标本，注意到在金属工艺（特别是青铜器铸造技术、金银制作技术和镀锡工艺方面）存在技术交流因素。如东胜碾坊渠窖藏、准格尔旗西沟畔遗址出土金制品与马家塬墓地出土金制品的制作工艺如出一辙；固原地区出土的镀锡铜牌饰也与马家塬等地相似，但年代均比陕西岐山孔头沟遗址出土西周中期镀锡铜匕首以及甘肃灵台白草坡镀锡铜器晚，说明镀锡工艺在这一地区有较长的流传时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固原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铜柄铁剑数量较多，部分保存较好，而类似的器物在陕甘宁地区其他地方也有出土，如礼县、灵台等地出土铜柄铁剑，宝鸡出土之金柄铁剑，以及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铜柄铁剑等。所以，如能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将可大大推动冶金考古的研究。

考察中我们也深刻意识到，丰富的文物资源一定要与当地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文物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所

以 我们既要能蹲下去探究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也要站起来向社会宣扬我们的成果,而不能将这些宝贝深锁在戒备森严的文物库房。通过这次考察,我看到了同仁的努力,也明白了将来要走的路。

加强区域合作,深化考古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焦南峰)

最近有幸参加了“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组织的陕、甘、宁、蒙四省区“戎狄之旅”考察,收获颇丰,同时也有一些想法。

以陇山为中心的甘宁地区和以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商周遗存及两周时期的戎狄遗迹与遗物过去基本上是我的知识空白,此次考察跑马观花地初步学到了一些东西,如:以洞室墓、铲足鬲为特征的东周时期西戎文化及其分布范围;以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殉葬大量的马、牛、羊骨为特征的春秋战国北狄文化以及战国时期与秦文化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赵国、魏国的一些文化因素,为今后个人以秦汉陵墓为主的研究开阔了视野,提供了资料。

多年来,陕、甘、宁、蒙四省区的考古研究根据各自省区历史、人文背景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研究重点。甘肃以马家窑、齐家、沙井、寺洼、早期秦文化及汉简、魏晋墓葬为研究重点;宁夏则在旧石器、西夏、魏晋及岩画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果;内蒙古区在史前文化、东周秦汉游牧文明、蒙元文化及岩画的调查研究上有长足进展;陕西省凭借深厚的文明底蕴在史前及周秦汉唐考古研究方面成就显著。

在陕、甘、宁、蒙四省区各自考古研究重点取得一定成绩,以地区为单元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基本建立的今天,各个地区之间古代文化关系的研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今后关注的重点,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是破解众多历史之谜的钥匙,也会对现实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价值。

出于上述考虑,作为一名老考古工作者,建议:

1.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从甘肃天水的西汉水流域开始,发现并发掘了礼县大堡子山城垣、大型建筑遗址,出土多件带铭青铜乐器,发现和发掘了礼县西山古城遗址及墓地,清理了礼县

鸾亭山礼制建筑遗址,发掘了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和清水县李崖遗址;在对秦文化的渊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随着早期秦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参与“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的甘肃考古所、北大、国博、陕西考古院、西大五家单位应与宁夏考古所、内蒙古考古所合作,将甘肃东北部、宁夏东南部、内蒙古中南部及陕西北部纳入研究视野,因为在这一广大区域内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西戎”、“北狄”文化及其与秦人关系的究明对秦文化因素的梳理及秦文化渊源的探明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2. 借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的组织和研究形式,以陕、甘、宁、蒙四省区研究单位为主体,聘请有关研究机构参与,分别组织“西戎文化”、“北狄文化”、“秦直道”等联合考古队在不同区域、不同地点,陆续启动工作,展开研究。

总之,改变过去的单兵(单个研究单位)、单兵种(考古学)作战的研究模式,加强区域合作、加强多学科合作,不仅是现实发展的趋势,也是深化考古学研究的必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各相关研究单位通力合作,秦文化、“西戎文化”、“北狄文化”的研究春天即将来临。

西戎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断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辉)

羌戎系民族在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发端于中国西北的周王朝、秦王朝与羌戎系民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书记载这两个王朝在建立之初都“杂处与戎狄之间”,秦人是在征服了西戎之后才不断变得强大。商王朝也和羌戎系的民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甚至在汉晋时期,史书中仍然有大量关于羌戎民族的记载,他们仍然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其后,在中国历史的舞台又有吐蕃王朝和西夏的崛起。可以说,羌戎系民族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在对周、秦历史和周、秦文化的研究中羌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不可避免要遇到的问题。

但古代羌戎系民族的考古学文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他的产生和演变经历了怎样的一个阶段,其中又有哪些文化参与了对羌戎系文化的改造和重塑?目前我们所得到的线索还是有限的。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将传说时代的中国古代族群分为五个系统,其中西北地区被认为是羌戎系民族的分布区域。严文明、俞伟超等先生将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族属也确定为与羌、戎有关。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为研究羌戎系民族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遗址中发现的与周秦系统考古学文化不同的以铲足鬲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被赵化成先生认为是西戎的考古学文化。随着近年来早期秦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在西汉水上游的调查发现了属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周秦系统的遗址和寺洼文化的遗址,寺洼文化的遗址应当是当时与秦人相对的西戎文化的遗址。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秦安王洼墓地和清水白驼墓地的发掘使我们认识到了战国晚期西戎不同部族的文化面貌,宁夏南部发现的一系列战国时期具有北方系青铜器文化面貌的遗址也被当成是当时西戎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本次考查中在陕西黄陵寨头河墓地和庆城博物馆发现的铲足鬲及其与铲足鬲相关的遗物说明在战国时期西戎文化在子午岭东西和六盘山东西都有分布,在关中平原的西部战国秦墓中也可以发现西戎文化的影子。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基本勾勒的西戎文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轮廓看其中存在很多的缺环。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西戎文化具有极其复杂的面貌,既存在着地域的差别,又和其周边文化以及更遥远的中亚和西亚的同时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同时不同地域的西戎文化除了具有一些共同的核心内容之外,其他文化在其中占有比重是不同的,因为与其周边的政治和文化关系的不同,其他文化在西戎文化中所占有的分量有差异,这也与西戎本身部落林立的情况是相符合的。比如在马家塬墓地中秦文化的因素占了较大的比例,来自于西方和北方的文化因素也有相当的比重,张家川地处秦人的后方,是秦人最早迁入的地区,同时还是西戎传统的根据地,而这一地区的西戎也是被秦人最早征

服的部落之一,受到秦人的羁縻,秦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刻;而寨头河墓地中除了与西戎文化有关的遗物外还有与三晋系统文化因素有关的遗物。

当然目前的这些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文化的分析和文献的对比而得出的基本结论。但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还需要更多的材料进行论证。有鉴于此,基于这次考察的思考,将来对羌戎系文化的研究应该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系统整理现在已经发现的和羌戎系民族相关的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的成果。系统全面认识羌戎系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加强考古学文化和古代民族之间对应的理论探讨,理清羌戎系考古学文化发展和演化的脉络,确定其文化的核心。充分认识其起源和发展的复杂性。近年来在河西走廊发现的一批汉晋时期的墓葬中可以看到明显不同的两种文化因素,一类是与中原汉文化相通的,而另一类文化因素则与西北地区传统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因素接近。这时期关于羌戎系民族的史料记载更加全面,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如果史书的记载不谬,可以认为他们的族属是当时的南山羌或卢水胡,其中的中原汉文化的因素是西汉设立河西四郡后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而与当地传统文化相关的因素则是可以用祖先记忆和文化认同来解释。进而,可以反推与其相关的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也应该是属于羌戎系民族的。

2. 要将对羌戎文化的研究置于更大的视野下。一方面需要在更大的区域内找寻与羌戎系考古文化相关的考古学遗存,另一方面需要把羌戎文化的研究放到更大的文化视野当中。秦穆公称霸西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重大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后果是一方面秦人稳定了自己的后方,另一方面这一事件引起的民族迁徙也带来了文化格局的大变化。西戎被打败后有向西、向南迁徙的部落,有迁入中原的部分,也有被秦人同化的部落。其中向南迁移的部落对汉代西南诸族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在民族学上有大量的证据,在考古学上也可以找到相关的蛛丝马迹。而在公元前10世纪开始的欧亚草原游牧化的过程大大加速了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进程,加之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和中西亚的希腊化进

程的完成,我们就不难理解在马家塬墓地中发现的大量与西方有关的文化因素。属于欧亚草原游牧地带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应该是当时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线路,在这条线路上有许多向南的通道,通过这些通道西方的文化传入了长城以南地区。而鄂尔多斯、陕北及陇东、宁夏南部地区可能是一条主要的通道。

3. 充分认识羌戎系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羌戎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贡献。了解羌戎系民族的华夏化过程。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北地区的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就和周边地区有着广泛的交流,其影响东至关中平原、西及东天山、南达岷江上游、北至黑河下游。其文化的发达程度并不比中原差多少。可能为中原文明带来了偏洞室墓、马、麦类作物、青铜技术等文化因素,参与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其影响仍然连绵不绝。当然,羌戎系民族一直是被当做华夏的边缘,但随着在战国时期开始不断进行的华夏化进程,他们最终也融入了大华夏。

4. 注重羌戎文化与周边文化关系的研究,认识周边文化对羌戎文化影响和政治变化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在西北新石器和青铜时代诸文化影响了周边文化的同时,他也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在改造和重塑羌戎系文化。已经发现的考古学证据证明,早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发达于俄罗斯南部和中亚地区的安德罗洛沃文化等文化因素就发现在

齐家文化当中,同时齐家文化中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进入战国时期,斯基泰、秦、三晋等文化都参与对西戎文化的改造和影响。当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存在着文化选择和政治上的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时期的西戎文化的面貌就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复杂综合体,这也符合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政治形势。

5. 深入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仅仅从传统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开展的研究还不能完全认识羌戎系诸族的文化面貌,也不能使我们更好地解释其变化和发展的机制。14C、生业形态、环境变化、体质人类学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各种材质文物的科学鉴定和分析、各类动物骨骼的多种方法的测定和分析,有助于我们确认其年代序列,从不同的侧面理解西戎文化的面貌,环境和生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可以看到立体的西戎文化。

当然,以上的探讨许多是基于零星材料的推测,属于断想,仍然缺乏坚实的资料基础,在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的脉络上还存在大量的缺环。而且,将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相对应也不是简单的事情,文化的发展也不是简单的线性进化,古代羌戎系民族的组成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工作和更多的考古资料去印证和解决,也需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责任编辑 张鹏程)